

华中敌后抗日虎将陶勇

蒋二明

陶勇中将，原名张道庸，1912年1月出生于叶家集周南庄一个雇农家庭。这位素以勇猛闻名全军的虎将，自1929年参加红军游击队，经历了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反“围剿”，创建川陕苏区、万里长征和西路军的艰苦征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团长、旅长、纵队司令员，是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抗日勇将；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军长、兵团副司令员，是华东战场的著名战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军委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

1939年5月，陶勇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团长。7月间，他率部攻打当涂朱门的一个日军碉堡，以诱伏战术将碉堡内的日军引进伏击圈，予以全歼。接着，又粉碎日军报复性的“扫荡”。在一次肉搏战中，他手刃日军指挥官，缴获一把指挥刀。粟裕很快看出陶勇是个智勇过人的军中硬汉，称他为“拼命三郎”。

11月初，为打破日伪顽军的封锁、限制，陶勇率四团主力二营行程300余公里，为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护送弹药500多担，顺利通过了日伪军严密控制的运河、公路、铁路、长江等封锁线，于中旬到达江北泰州的两李驻地，进而与两李部队建立了统战关系。按陈毅、粟裕首长“瞒天过海”之计，他改名陶勇，二营与挺进纵队梅嘉生支队合编后改称新四军苏皖支队，陶勇任司令员。苏皖支队挺进苏皖边区，从而造成江南新四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陶部进驻仪征以北的月塘集地区后，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接着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趁火打劫的企图，及时地援新四军第四、五支队打退苏皖两省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举大规模摩擦，又紧急增援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郭



陶勇



陶勇夫妇

村，配合挺进纵队打退顽军的多次冲锋，保卫了郭村，形成苏南新四军的东进序曲。

1940年10月，陶勇任新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在黄桥决战中勇挑重担，率部胜利坚守了黄桥，奠定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接着率部东进黄海之滨的南通、如皋(包括今如东)、启东、海门地区，开辟和建立苏中第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并兼任苏中四分区司令员。这一地区临江滨海，邻近上海，位于长江口北部，被善弈围棋的陈毅称为“金角银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一次，陶勇带1个班刚在村里住下，日军就把他们包围了。打到最后，只剩下陶勇一个人，子弹也打光了，日本兵嗷嗷叫着要抓活的。陶勇拿起一根扁担劈倒两个日军，冲出了包围。

1941年2月，三纵改编为新四军第一

师第三旅，陶勇任旅长。他率三旅及苏中四分区军民积极抗日，不断打击日伪军，巩固抗日根据地。二三月间，他指挥第七团先后3次进逼海(安)富(安)公路上的几个村镇，破坏公路，伏击日伪军。他还亲率第八团插入敌后，不断袭击北刘桥、金沙等地日伪军。

苏中四分区一直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战斗最频繁的地区。1941年，第三旅兼苏中四分区对日伪顽共作战160次，占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作战总数的44%，共毙伤日伪军3900余人、顽军2000余人，而三旅主力和地方武装虽伤亡1000多人，却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此后，他率部艰苦战斗在“清乡”圈内外，粉碎了日伪军对四分区的第一期“清乡”、“延期清乡”和“强化清乡”。他曾在一夜之间发动80万军民在150公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锯倒电杆，割断电线，捣毁公路，

火烧绵延几百里的竹篱笆。中共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在给陶勇等人的嘉勉电中指出：“四分区工作是苏中最有成绩的”，“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是中国抗战史上大事件”。

1944年春，四分区军民又陆续粉碎日伪军的所谓“屯垦”、“肃整”、“高度强化清乡”、“保养清乡”等罪恶目的。陶勇还率三旅主力跳到“清乡”圈外，在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州、如皋等地对日伪顽发动连续进攻，其中在车桥战役中，担任主攻的三旅七团攻下日伪军碉堡52座，毙伤日伪军官兵298人，俘168人，创华中生俘日军之新纪录。第七团被誉为“新四军老虎团”。陶勇之威名，使苏中时伪闻闻风丧胆，而广大人民则称赞陶勇为勇将、虎将。后在攻势作战中他率部驰骋大江南北，收复数十个县城及较大市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肩膀，笑着问：“小鬼，你们在我家‘搞破坏’呀！”

大家看到是詹司令，立即放下手中的活立正回答：“首长好！我们按计划给您家维修房子。”老将军脸色顿时严肃起来：“我怎么不知道？”得知维修是按规定批准的后，他又说：“我的房子好好的，补补就行，不用大修；要修也绝不能超支、不能搞豪华，能用则用，尽量节省。”

说完，他放下手中的黄布包，在屋内屋外仔细检查。看到盥洗间的水盆裂了两条缝，工人准备换新的，他立刻按住工人的手：“水盆不用换，有裂缝就用脸盆接水，既能发挥脸盆的作用，还能方便水的二次利用。”当看到工人更换浴缸时，他更是生气地说：“好好的浴缸动它干什么？简直胡闹！”

其实，老将军用的是20年前的老式浴缸，缸沿很高。组织考虑到他战争中腿部受过伤、行动不便，想换个矮缸。但詹大南说：“不用换，做个木台阶就行。以后腿脚更不灵便，就加个两级木台阶，慢慢跨，你们别担心。”

这只浴缸十分陈旧，釉层早已磨掉，表面凹凸不平，白缸变成了“灰缸”。詹大南让大女儿詹文拿来“清瓷净”，和公务员一起用清洁球擦洗，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擦干净。他满意地说：“你看，这不是很好吗？”

南京的冬天虽不如北方寒冷，但湿度大，同样刺骨。很久以前，老将军家靠锅炉取暖，燃煤由组织免费供应。但为了省煤，每到冬天，他都把室内温度控制在12—13℃，还亲自规定、检查公务员给锅炉添煤、封火的时间。家人劝他多烧会儿锅炉、提高室温，他总反问：“那么多没暖气的家庭，人家怎么过冬？”

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炳德得知后，特意找到他说：“老首长，您家取暖用煤有充分保障，暖气烧热些不容易生病，对身体好啊！”詹大南回答：“这样就很好，我不觉得冷。冷了有部队发的棉衣、棉被，多穿点就行，你们不用操心。”

回到家后，他对子女们说：“军区一直很照顾我们，陈司令连我们家用煤的事都想到了。组织越是关心，我们就越要自觉，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增负担。”

为了进一步省煤，他还经常动员家人和勤务人员上山捡枯树枝当燃料，有时自己也会动手。就这样，老将军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冬。



胡遵远

金寨籍开国将军的“俭”字初心

——镌刻在岁月里的红色家风

金寨籍59位开国将军，不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冲锋陷阵、浴血奋战，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而且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始终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洪学智：一床毛巾被“盖”三代人

1948年1月，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的洪学智率部解放辽阳，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军官的一床鸭绒被。经组织批准后，这床鸭绒被分配给洪学智使用。当时鸭绒被的被套已破损，平津战役结束后，他的夫人张文在安东市花费20多元钱购置了一条新被套。从此，这床鸭绒被陪伴洪学智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湘赣战役和广东战役，直至抗美援朝战争，前后使用了十多年。

1949年10月14日，洪学智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解放广州，他用个人津贴在当地购买了一床毛巾被。这床毛巾被跟随他跨过鸭绿江、奋战在抗美援朝战场，陪伴他参加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也见证了他初任总后勤部部长及下放吉林省担任农机厅厅长的难忘岁月。“文革”期间，他将这床毛巾被送给大儿子洪虎夫妇，后来又传给孙女、孙女。20世纪90年代，洪学智的夫人张文从洪虎家中取回这床毛巾被妥善保管。一床普通毛巾被使用了50多年，“盖”过3代人……洪学智将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可见一斑。

徐立清：衣不重彩、食不重味

1950年，被毛泽东主席称为“我党我军好同志、好干部”的“三让将军”(让军衔、让级别、让职位)徐立清，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工作后，一家人被安排住在北京东四三条的四合院里。他对此深感不安，多次与管理部同志沟通，希望将住处让给年资深的同志，说道：“我有三间房子就够了，一间做卧室，一间接待客人，一间供工作人员住。”

徐立清将军衣着极为朴素，无论在总部工作还是到基层检查，始终穿着一双圆口布鞋。当时总干部部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为他买了一双皮鞋，建议他在开会或重要场合穿着。徐立清对这位同志说：“我常要去农村、去山区，那里的群众连饭都吃不饱，看见我穿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皮鞋，人家会怎么想？穿布鞋最合适，一是少花钱，二是穿着舒服。”第二天，他便将新皮鞋退了回去。

曾担任赖传珠副部长秘书的毛华山回忆：“徐立清在总干部部工作期间，除上班穿军装外，其他时间都穿便装。到了冬天，他穿的是战争年代留下的旧大衣，很多同志劝他去被装仓库换件新的，他总乐呵呵地说：‘不管新的旧的，穿上不冷就好。’”

徐立清偏爱辣椒和咸菜，有时因加班耽误吃饭，为不给机关食堂工作人员添麻烦，他就简单要碗米饭，就着辣椒凑合一餐。他不抽烟、不饮酒，处处节俭，这种艰苦朴素的美德在总部机关中广为人知。

徐立清的生活作风不仅感染了身边工作人员，更对家人产生深远影响。他的爱人党秀玉是“三八式”老干部，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始终严格。徐立清去世几个月后，党秀玉主动将宽敞住房让给他人，把徐立清的车交还组织，带着全家十几口人搬进北京东四三条的普通四合院。

曾绍山：“让那位阿姨惊呆了！”

曾绍山中将的女儿曾明顺回忆，她上初中时，一位不认识的领导夫人执意要到家中参观，想看看沈阳军区政委的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当这位夫人看到曾绍山家中除被褥外，其他用品全是公家配发时，十分吃惊；而当她翻开曾绍山夫妇的枕头，更是惊得嘴巴张大，许久合不上——枕芯里装的是孩子们穿旧的小衣服。

曾明顺说，父母一生极为简朴。在她印象里，父亲总穿一身布军装，母亲衣着也很普通，姐妹三人的衣服都是她妈和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1965年，曾明顺考入第四军医大学，母亲送给她两双袜子——这是把新布料从底子中间剪开、翻上缝好，再缝上袜垫制成的。当时尼龙袜子已普及，这种布袜显得很“土”，成了同学们的笑料，但曾明顺回家后发现，父母穿的都是同款布袜。

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粮食短缺。曾明顺在学校伙食尚可，因此不太愿意回家——家里饭菜不如学校，父母每天吃的都是水煮青菜。

曾明顺在北京卫戍区工作期间，曾绍山曾赶到北京开会的间隙去看她。将军穿着布军装，直接走进她住的筒子楼，还主动和邻居打招呼。邻居们对曾明顺说：“你父亲衣着朴素、待人亲切，一点不像高级干部。”

于侠：最恨贪污与浪费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遇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曾亲历南泥湾大生产的于侠将军(原名李顺堂)，积极响应党和政府救灾减灾的号召，拿起锄头在庭院里种植小麦、玉米、南瓜、丝瓜、西红柿等粮食和蔬

菜。翻土、下种、浇水、施肥、除草、授粉，他手把手教孩子们农活；还教孩子们识别灰菜、马齿苋、水芹菜、车前草等野菜，以及养鸡、养兔的方法。他边教常识，边要求孩子们节约每一粒粮食、每一分食物——哪怕是吃剩的菜水，也要加开水搅拌后喝下，还戏称这是有营养的“高汤”，同时给孩子们讲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长征中战胜艰难困苦的故事。

于侠的大儿子李新回忆：“父亲有个习惯，饭前总要把桌子擦干净。不管是谁，掉在桌上的米粒或菜，必须捡起来吃掉，否则不许再吃饭。他一生只穿军装，在家听到水龙头滴水就会去关，也不允许空房间亮灯。我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家里最恨的就是贪污和浪费。”

董洪国：艰苦奋斗是革命胜利的法宝

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但董洪国将军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有一年董洪国过生日，女儿董汉荣给他买了一件“杉杉”牌衣服，笑着说：“爸，今天是您生日，我给您买了件衣服，您试试合不合身？”当时几百元的衣服还很罕见，家人纷纷劝道：“老爷子，试试吧！这是名牌，可贵着呢！”

董洪国没有丝毫高兴，反而皱着眉头问：“多少钱？”得知价格上百元后，他立刻生气地说：“我不穿！买这么贵的衣服干什么？穿什么不都一样？”董洪国常对家人说：“艰苦奋斗是革命胜利的法宝，要天天讲、时时讲，只有长期保持这种传统，我们才能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詹大南：“吝省”省用煤

詹大南将军在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期间，一天下班回家，刚进院门就看到一名战士带着几位工人在院里忙碌——有的修补墙面，有的检查水管。将军轻轻拍拍战士的



红土地

E-mail: 48221941@qq.com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扫码，品读六安故事



汉武巡霍留遗珍

古南岳文化留下的历史密码

郑凤琴

位于大别山东北麓的霍山，古时称英、灊，是上古时期皋陶后裔的封地英氏国的核心区。秦朝属衡山郡，汉朝曾是淮南国、衡山国属地，公元前202年置灊县，至隋开皇元年始称霍山县。

志载“霍居五岳之一，区画于轩皇，肇封于虞帝”，《尚书·舜典》载：“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礼。”种种史料显示虞舜、秦始皇、汉武帝等均巡狩过霍山，这也是国内外历史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巡狩灊县(即古南岳所在地霍山)的历史最为社会各界关注。

从黄帝画野分州封四岳，到隋文帝诏定湖南峻山为南岳，南岳衡山居霍山长达3200多年时间。《史记·封禅书》记载：“其明年冬(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琊，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礼虞舜于九嶷，登灊之天柱山。自浠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琊，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

两部古籍共同记述了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封禅南岳的壮举，也是众多古代帝王封禅南岳活动中记载最为清晰的一次。古南岳文化历经几千年的洗礼，如今仍在历史古籍中熠熠生辉，在口口相传的地名故事中令人回味，成为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千年文化基因。历史总是不断映照现实，在汉武帝封禅所走过的路线图上留下了很多富有纪念意义的地名，这是古南岳历史对现实的真实映射。

尽管汉武帝南巡仍有许多待解之迷，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南巡各地政通人和，百业兴旺。他对在盛唐望礼虞舜南巡仙逝之处九嶷山、在灊县封禅南岳山、在江上射蛟等行程都非常满意。回宫下诏免去这次巡狩所过郡县的田租和人头税，并赐粟孤儿丝帛粮食。在君权神授的光环下，封建帝王祭祀过的地方和经过的路线得到保护，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目标，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地方历史文化记忆。经过世人不断演绎，便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地名：武陟山——戴家(待驾)河——迎驾厂——南岳山——复览山——指封山——大雨(打鱼)冲——晾甲(梁家)滩——官(曾)家渡——留驾园——上(尚)驾园——送驾(宋家)河及相关的地名故事，还有古城内的犇道(街)、南坛(潭)、拜郊台、灊台寺等。这些具有真实历史来源的地名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更能回答“汉武帝登临灊之天柱山今何在”的世人之问。

汉武帝在盛唐山望礼虞舜南巡仙逝之处九嶷山，因汉武帝登临过此山，盛唐山改名为武陟山，现属裕安区。《古今图书集成·庐州府山川考三》中记载：“武陟山，在州西三十里，汉武帝南巡登封霍岳驻跸于此。”汉武帝从盛唐山前往灊县巡狩封禅，地方官员和沿途群众在时与九江郡、六安国和灊县接壤的地方等待圣驾，想一睹龙颜，这是灊县(属庐江郡)范围内第一个等待圣驾的地方就被称为待驾河，后来演变为戴家河，也是霍山古渡口之一。

从戴家河沿浠河而上，距古城西边5公里外是当时迎接汉武帝巡狩仪式的地方，此地得名为迎驾厂，迎驾集团的企业文化与之渊源颇深。汉武帝从迎驾厂乘辇车到县城为封禅南岳做准备，在《霍山县志》古城图上明确标有当时为皇帝出行修建的犇道(现在二中操场一带)。

汉武帝南巡到灊县的主要目的是登礼天柱山封禅南岳，彰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按汉朝祭祀礼仪规划，汉武帝走犇道出城，在老城南门口筑方形坛(后叫南潭)祭地，在天柱山上选址修建南岳神祠并筑圆形坛祭天。此举效法古代帝王祭天地以报天地之功。为了纪念封禅的神圣历史事件，遂将这座古代帝王登封过的山叫南岳山，南岳山归属地叫衡山镇。现在南岳山顶的北天门楣上有“汉帝敕封”的匾额。历代《霍山县志》和《六安州志》均记载，当时在南岳山顶建有南岳神祠、汉武帝曾亲手种植凌霄树和碧桃树各一株。明代进士、礼部主事吴兰的《南岳记》中有“传自汉武之手植。碧桃如故，凌霄岁久，止存其根茎云。”

从《六安州志》和《霍山县志》的相关内容看，汉武帝登礼灊之天柱山时曾到周边灊台寺游览、复览山赏景、佛寺岭狩猎。在《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时期地图中也十分明确地将天柱山标注在灊县县城，而现在的潜山县旧属古皖国，西汉时为皖县，灊与潜没有古今字或通假字关系，其境内的山称为皖山。东晋时废皖县置怀宁县，元代时析怀宁县置潜山县，后改皖山叫天柱山，不能与霍山古南岳历史混为一谈。

汉代时城东门外的扑龟山景色秀美，汉武帝游览时不断回望自己封禅的南岳山圣境，现存明代“汉帝重游”石匾，后人遂将扑龟山改名为复览山。汉武帝登临复览山时，手指旁侧山峰赞叹不绝，后称此山为指封山。

汉武帝巡狩南岳时曾去佛子岭一带狩猎，不巧天降大雨，途经山路被大水冲成一条大山冲，故而称大雨冲，久之此地被叫成了打鱼冲。随行将士在下游河滩晾晒盔甲，此处得名为晾甲滩，现为梁家滩。

汉武帝完成封禅南岳的神圣任务后沿浠河而上走江淮驰道前去寻阳枞阳一带，往长江射蛟，北上泰山封禅。汉武帝途经渡口由此得名官家渡，后成官驾渡，现在是水库淹没区。过官家渡，汉武帝休憩地称为留驾园，出发地称为尚(上)驾园。汉武帝离开灊县时，文武百官跪送圣驾的地方被称为送驾河，后演变为宋家河。经过走访调查，当地一直没有宋姓人家居住过。

这一个地名，都是历史的“活化石”，文化的“见证者”，霍山人民的根脉瑰宝，更是镌刻在霍山红色土地上的历史密码，流淌在岁月里的文化血脉，萦绕在游子心头的乡愁印记，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